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看翻译文学的归属

李安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认为,文学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旅行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语言层面的变异、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以及受接受国具体境遇、文化语境影响而产生的变异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只有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来重新审视当今学界众说纷纭的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方能对其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把握和定位。

[关键词] 比较文学变异学; 翻译文学; 归属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5-0116-05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学术问题。围绕中国(本土)文学、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学人们对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自不同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关于翻译文学归属的几种不同学术观点。

观点一,翻译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派观点以贾植芳、谢天振为代表。贾植芳在其指导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批评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我们还把翻译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当然,为此派观点摇旗呐喊、用力最多者还是谢天振,“我们如何确定某一部文学作品是还是不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呢?这里一个主要的、恐怕也是唯一的依据是文学作品创作者的国别……我们应该可以清楚,《高老头》的创作者(尽管是二度创作)是中国的文学翻译家傅雷,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2]在这里,谢天振以文学作品的创造者或再造者(译者)的国籍作为判断翻译文学归属的主要依据。翻译文学作品的作者是中国人,中国人创造的文学作品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

观点二,翻译文学就是外国文学,此派观点以王树荣、施志元为代表。1995年,王树荣在《书城杂志》上撰文,明确反对把翻译文学看成中国文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文学怎么是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呢?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文学’?”^[3]针对王树荣的观点,谢天振同在《书城杂志》上撰文予以反驳(详见上文),而施志元也在《书城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谢天振的反驳进行了再反驳,“谢先生举出了不少文学史都有翻译文学的章节。我认为国别文学中应该有翻译文学的章节,用来说明外国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但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4]

观点三,突出翻译文学的独立地位,认为翻译文学、外国文学、本土文学(中国文学)是既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针对上述两派截然对立的学术观点,王向远就提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他指出,“翻译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部门,翻译文学史应该是与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相并列的文学史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翻译文学史,这三者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的知识体系。”^[5]刘耘华也不赞成将翻译文学定位在民族文学之中(同样,也反对把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而主张翻译文学应与民族文学、外国文学鼎足而三。而张友谊则从翻译文学距离本土文学、外国文学的远近距离着眼,提出描绘三者之间关系的“不等边三角形”论。“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这条边最长,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这条边最短。”意即“相对于同民族文学的关系,翻译文学同自身有渊源关系的外

国文学的距离更近。”^[6]这其实是在突出翻译文学的独立性地位的同时,对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三者关系的疏密程度的一种描述和表达。

观点四,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传统学术观念,突出翻译文学国籍的模糊性、双重性和游离性。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我们需要考量或观察的事物总是存在于一个我们预设的“关系网”中,一种“有意义”的关联。在这里,这种“有意义”的关联应该是由我们据以展开研究的研究目标而衍生的,“既然研究目标各有不同,某种理论的充分性也不能一概而论。”^[7]据此,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南峰认为,“翻译文学是否应视为目标文学的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否假设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之间有一些‘有意义’的关系。埃文—佐哈尔认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所以翻译文学是目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8]但如果研究目标发生了变化,把翻译文学置于源语文学的系统里予以关照的话,我们却又不能抹杀翻译文学的外国身份。所以张南峰主张就如同一个人能同时拥有双重国籍一样,我们也应承认翻译文学的双重国籍,“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模糊性、双重性甚至游离性,才是出路所在。”^[8]

除上述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外,也有些比较省力或者狡猾的说法,比如有的人就认为翻译文学具有本土性和外国性,所以主张翻译文学既是本土(中国)文学也是外国文学。总之,对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翻译文学归属何处?究竟哪家之言更趋合理?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特征,它有别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同源性比较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类同性比较,而是把差异性特别是异质文明间的差异性作为一种全新的可比性。由“求同”到“辨异”,深入探究文学在语言、形象、文本和深层文化上的变异现象,并从中揭示出这种变异现象的深层原因和内在规律。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结果和产物,由于受语言、文本、译者和接受国具体语境、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文本从一国向另一国“旅行”的过程中,源语国文学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上发生不同程度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变异,而翻译文学就是这种已经变异了的文本。

笔者窃以为只有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梳理和阐释,方能达到对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把握和定位。

一 语言层面的变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间无论是在外形、遣词造句的文法规则还是在其所承载的文化底蕴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英语就是表音文字,而汉语则是表意文字,它们各有一套自己的使用规则和言说方式。“当一个人讲着或翻译中文的时候,他就在比喻的意义上变成了中国人;当一个人讲日语的时候,他就‘成了’日本人。”^[9]具体到文学作品的语言上,由于中西方文学作品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语言差异,就会使各自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在意境、审美趋向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这种语言本体上的差异则是外国文学跨国旅行后产生变异的一个无法规避的原因。

翻译文学是用译者本国的语言创造的文本,与原作相比,作品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势必会影响到原语文学在音律、艺术风格、审美情趣以及文化蕴藉等方面的细微变化,尽管在基本的情节、思想主题上大致相同。比如中国的古诗,对仗工整、平仄押韵、韵律优美,字句精短而蕴藉醇厚,给人一种特有的审美体验。这是中国语言自身的特点所造就的,任何西方国家的语言也无法传达中国古诗的特有韵致。在此意义上讲,中国的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是无法翻译的。西方的十四行诗也是同样的道理,其独特的韵节、韵味等艺术方面的优点也是汉语所无法传达的。严复主张“信、达、雅”,“信”就是翻译文学一定要忠实于原著,但这不是绝对的“忠实”,双方语言上的差异已经先天预设了这种不可改变的差异性,所谓“忠实”只能是一种接近原著的持续努力。所以,呈现为与源语文学语言表述形态上完全相异的翻译文学已经不再是本真意义上的源语或者外国文学了。正如米勒所言,“翻译实际上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创作一种新的文本,这种文本将是嫁接在原文之上,并从原文那里获得生命;同时它又有别于原文,正如嫁接的树枝区别于从根部长出的树木一样。”^[10]

二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是文学翻译实践的主体,由于他与原作者所处的时空有很大差异,因而双方所面临的具体境遇、时代风尚、文化场域、民族审美心理、深层文化底蕴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译者本人的文学表达、创作经验、审美感受、价值判断甚至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与原作者存有这样和那样的差异,这就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是原作的完全本真的呈现。相对而言译

者具有较大的翻译自由度,而有的译者也会出于种种目的故意改变甚至歪曲原作的原貌。在某种程度上讲,翻译即意味着二度创作,这就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意大利有句谚语说“译者都是叛徒”,这就势必会造成翻译文学尽管在基本情节、思想主题上与原作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语言叙述风格、意义呈现方式上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文学性越强,引用源语文化元素越多的作品,在翻译过程所经历的增减也相应地高”^[11]。所谓,“译必讹”,其实这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国近代的翻译家林纾不懂外语但却能在别人的口述下一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多国的文学作品,而且翻译语言采用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严复把一部社会科学著作《天演论》却能翻译成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中译本,还有日本的豪杰译,这都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极大的“叛逆性”行为。他们不是绝对的“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匠”,而是更多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渗透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语言风格、审美体验、价值判断和文化素养的创作者。郭沫若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曾在《雪莱的诗》中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12]

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中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

如前所述,译者在具体的文学翻译过程中所从事的绝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等值性”转换工作,而是一种基于自身本土文化立场,努力协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冲突,以期实现更好地转化、对话和交流的创造性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过滤是译者实现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必然选择,也是文学跨国“旅行”的必然结果。“文化过滤必然使得交流信息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是接受主体文化过滤的结果,所以变异是接受者主体的选择性、创造性的表现。”^{[13]282-283}比如上文提到的包括林纾、严复在内的一些中国近代早期的翻译家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大都采用当时为广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文言文,而林纾的译作《黑奴吁天录》中也被注入了更多的关于“忠、孝”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等等,这都是一种外国文学作品的本土化处理策略。无论译者知或不知、有意或无意,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筛选、增删、变形、歪曲,这种立足本土的文化过滤现象都深刻地彰显出翻译文学相对于外国文学的那种客观存在的变异性。以此而观,翻译文学已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而是经历了本土文化过滤后的

外国文学,无论在文本语言、形式有时甚至是思想内容上已打上本土文化和文学的印记,体现出的更多的是本土文学作品的特征。

文化误读也是译者翻译活动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文化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会因文化过滤的原因而造成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这样也就会因发送者文化与接受者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影响误差,或者叫做创作性接受,这就形成误读。”^{[13]206}文化误读其实就是异质文化双方因文化模子的差异而引起的对他者文化认知上的偏差,而这种误读在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中是必然存在的现象。比如寒山诗在跨国“旅行”后所经历的由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到美国文学“经典化”构建过程,就是翻译过程中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案例。尽管寒山诗的经典化有包括社会背景、文化意识形态、赞助者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译者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对寒山诗的“美国化”和“嬉皮士”化的文化误读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斯奈德的翻译中有意误译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他的创作性误读,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隐者寒山俨似战后那些衣着不修边幅、形迹放荡不羁的“嬉皮士”们。

以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为主要特征的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使得翻译文学较源语文学而言已经产生了诸多程度不同的变异,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文学无论是文本的存在形态还是其艺术风格、表现技巧甚至在思想内容、审美体验上均发生了变异。“正是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也决定了翻译文学应该在译入语语境里寻找它的归宿。”^[14]

三 受接受国具体境遇、文化语境影响而产生的变异

西方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使人们对文学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阐释学注重个人所处的特定时代氛围和历史文化传统对文本阐释的深刻影响;解构主义宣称“作者死了”,更加突出了读者或译者对文本阐释所拥有的高度自主权;而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启示我们,任何人的活动包括译者必受制于“当下”的以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为主要内容的权利话语;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亦均凸显了实践主体背后鲜明的政治立场、阶级观念、民族意识等一系列的主体意图。学者吴兴明在谈到“理论旅行”时曾说,“‘理论旅行’是在旅行在地所展开的不同于‘原本’的另一种‘历史’。所谓‘异’不仅是指理论

观念的变化和差异,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另一个根本不同的“历史”。历史的立场成为认定二者差异性的根据。不是因为变化才有历史的差异;而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所以变化是必然的。”^[15]这同样适用于“文本旅行”的情景,在文本的跨国“旅行”中必然会遭遇因为异国的迥异的“历史”而造就的翻译文学与原本之间的殊异。

上述表明,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异质文化背景必然使翻译文学呈现出其所处时代或历史情境的“权利话语”的印记,从而更好地契合本土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的发展需求。翻译文学的这种受本土文化传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筛选后的变异性必然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原作的另种面貌,它已不再是本真意义上的外国文学。

其实,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出现和繁荣就和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情景”有着紧密的关系。近代以来,我国倍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内忧外患,国力式微。为挽救民族危亡,一些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而翻译成了当时最主要的手段。梁启超鼓励译介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小说”以唤醒民心、革新政治;鲁迅也主张文学翻译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和周作人一起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受压迫的东欧、北欧一些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而这种功利性很强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在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沟通、对话中完成的,此时源语文学在翻译传播的“旅行”中已经发生了衍变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文本了。比如,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在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世界文坛上均不是一位像在中国那样受欢迎的作家。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译进中国后却因为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极为暗合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融入了太多当时中国的社会元素、时代因子,它所获得的新质是原作中不曾存在的,这种受“历史语境”影响而产生的变异是使它成为典型的中国化文本的重要原因。

而有些源语文学由于经历了时间的流逝而到达异国后,特定的阅读对象及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早已成为过去,另一时空的接受对象在面对异国文本时必然是一种全新而迥异的阐释,这时的译者身上及其所创作的翻译文本中必然有太多的创造性叛逆。例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原本在英国是一部寓意深刻的政治讽刺小说,但是时过境迁,当这

部小说被译介到异国之后,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都因为作品中丰富的想象力、怪诞诡异的离奇情节而把它当作了梦幻小说,甚至认为是儿童小说。再比如前文提到的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构建,也是由于时空的巨大差异、文化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异质同构”的结果。这使得源语文学文本经历的变异更大,再说翻译文学就是外国文学也纯属欺人之谈。

当今学界对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争议还在继续,但是现在大家普遍都认为翻译文学已不是本真意义的外国文学了,翻译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的陈腐观点似乎已经随着人们对翻译文学的性质、特征和本质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被人摒弃了。因为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来看,正如上述分析所揭示的,翻译文学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在译者的创作性叛逆以及接受过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均较源语文学作品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异现象,这是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那么,说翻译文学就是本土文学的观点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来看,同样也存在问题。我们虽然强调文本在“旅行”过程中由于诸多文学因子扭曲变形、筛漏失落而造成的变异现象,但我们却仍承认他者的存在,这种变异只能是在他者基础上的变异。我们探讨考究文学的变异现象就是为了在“求异”的基础上,通过异质双方的交流、对话,从而实现更好的融合以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同”,这种“异质同构”是文学变异学研究、也是跨文明交流传播的终极目的。比较文学变异学除了提供给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种全面、整体但又不失精微、深刻的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科学视野。以此而观,虽然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但翻译文学赖以形成的底本仍是外国文学作品,它赋予翻译文学基本的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中心思想等文学文本本质素,我们决不能忽略这个有意义的他者。所以,把翻译文学说成就是本土文学的观点似乎完全无视原作的存在,这也是一种偏颇的看法,也与当下我们的跨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学术实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体现。至于外国文学、本土文学、翻译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三足鼎立”还是“不等边三角形”,恐怕还得视具体情形而定。如果翻译文学与源语文学之间的变异不大,“不等边三角形”论似可成立;反之,如果就上文所述的林纾译、豪杰译、寒山诗的美国经典化而论,二者之间的变异较大,似乎“三足鼎立论”更为科学合理些。而对于翻译文学既是外国文学也是本土文学的观点,看似中肯,实为“骑墙派”。它抹杀了翻译

文学的独特价值,不土不洋,亦中亦洋,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不明确,反而愈辨愈糊涂。

所以,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我们只有从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来考察、梳理方能较为全面的把握这一最富争议的问题,去伪存真,得出科学公允、合理的结论来: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但它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本土文学;而是作为本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学并存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

[参考文献]

- [1] 贾植芳.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 [2] 谢天振. 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J]. 书城,1995(4):25-27.
- [3] 王树荣. 汉译外国作品是“中国文学”吗?[J]. 书城,1995(2):12-13.
- [4] 施志元. 汉译外国作品与中国文学——不敢苟同谢天振先生高见[J]. 书城,1995(4):27-29.
- [5] 王向远.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前言[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6] 张友谊. 翻译文学归属之研究——“不等边三角形”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5):58-60.
- [7]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J]. Poetics Today, 1990(1).
- [8] 张南峰. 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J]. 外国语,2005(5):54-60.
- [9] Brian Castro. Looking for Estrellita[M].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9:152-153.
- [10] 转引自张旭.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5.
- [11]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3.
- [12] 郭沫若. 雪莱的诗[M]//转引自王向远.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152.
- [13] 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 [14] 谢天振.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 渤海大学学报,2008(2):33-38.
- [15] 吴兴明. “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之立场或视角的考察[J]. 江汉论坛,2006(7):114-118.

Study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Employing the Theory of Vari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 An-gu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vari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lieves that the text of literature must change in three aspects when it travel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hat is the variation of language, translator's "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variation that caused by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received country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hat the pundit disagree on in 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can be grasped and located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only if employs the theory of vari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vari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categorization